



网络党建能力论

——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薛小荣、王萍◎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2CDJ008) 阶段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11EDS001) 阶段成果

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网络党建」系列研究最终成果

时事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DJ008）阶段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1EDS001）阶段成果
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会“网络党建”系列研究最终成果

网络党建能力论

——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薛小荣\王 萍◎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络党建能力论：信息时代执政党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薛小荣，王萍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5
ISBN 978-7-80232-717-7

I. ①网… II. ①薛…②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
互联网络—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008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行热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25 字数：258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克服信息时代“本领恐慌”，积极提升网络 社会治理能力	(1)
第一章 党务管理能力	(17)
第一节 把握党务管理能力的内涵	(18)
一、工作方式	(18)
二、信息素养	(20)
三、系统平台	(21)
第二节 增强党务管理能力的意义	(24)
一、提升党务活动的管理效能	(25)
二、增强党员的民主参政能力	(28)
三、克服党员组织生活的缺位	(30)
第三节 提升党务管理能力的途径	(33)
一、以信息存储的数字化实现党员党组织信息编码的 精确管理	(34)
二、以信息流动的瞬时化实现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的 动态管理	(36)
三、以信息选择的差时化实现党员党组织信息传播的 统一管理	(38)
第四节 案例解析：湖北荆门市利用 QQ 群加强党员管理	(40)

第二章 声誉维护能力	(43)
第一节 把握声誉维护能力的内涵	(44)
一、政治理念	(44)
二、政策工具	(47)
三、作风形象	(48)
第二节 增强声誉维护能力的意义	(51)
一、提升党员群众的政治归属功能	(51)
二、增强引领社会的政治示范功能	(56)
三、扩大组织吸纳的政治包容功能	(62)
第三节 提升声誉维护能力的途径	(65)
一、加强形象管理，密切党群关系	(65)
二、发挥理论引导，增强政治认同	(69)
三、规范权力运行，践行宗旨使命	(72)
四、树立阵地意识，坚持守土负责	(74)
第四节 案例解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 Facebook 维护党的形象	(77)
第三章 媒介交流能力	(80)
第一节 把握媒介交流能力的内涵	(81)
一、思维观念	(81)
二、语体符号	(86)
三、情感情绪	(89)
四、形式方法	(90)
第二节 增强媒介交流能力的意义	(93)
一、信息获取方式的转变，促成了组织与个体共享信息的 新局面	(94)
二、主—客体关系的转变，强化了虚拟环境主客体身份的 新角色	(98)
三、媒介交流环境的转变，形成了虚拟环境中身心分离的 新规范	(102)
第三节 提升媒介交流能力的途径	(107)

一、树立平等、开放、包容的交流态度	(107)
二、突出“精、实、新、快”语言风格	(110)
三、投入真挚情感以满足网民精神需求	(114)
四、运用灵活、互动的多点式交流方式	(116)
第四节 案例解析：漫画形象：“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	(117)
第四章 意见表达能力	(120)
第一节 把握意见表达能力的内涵	(121)
一、表达立场	(121)
二、表达态度	(125)
三、表达意涵	(127)
四、表达机制	(131)
第二节 增强意见表达能力的意义	(135)
一、网络声音的“多语”，需要执政党网络意见表达的 “存在彰显”	(136)
二、网络空间的“多元”，需要执政党网络意见表达的 “能力重塑”	(139)
三、网络民众的“多疑”，需要执政党网络意见表达的 “理性关怀”	(143)
第三节 提升意见表达能力的途径	(146)
一、增强意见表达的解释力	(146)
二、提升意见表达的亲和力	(149)
三、强化意见表达的组织力	(154)
四、扩大意见表达的影响力	(157)
第四节 案例解析：“上海阿键”的博客	(161)
第五章 舆情引导能力	(164)
第一节 把握舆情引导能力的内涵	(165)
一、观念认识	(165)
二、能力素质	(167)
三、组织机制	(171)

四、舆情特征	(173)
第二节 增强舆情引导能力的意义	(176)
一、把握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引导网络舆情有序发展	(176)
二、增强网上网下的双向互动,缓解现实社会矛盾激化	(179)
第三节 提升舆情引导能力的途径	(181)
一、掌握舆情社会成因,主动开展心理疏导	(182)
二、整合舆情治理力量,形成全党参与格局	(185)
三、培养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影响议题设置	(187)
四、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及时正面加以引导	(189)
五、加强依法治网原则,着力规范网络行为	(191)
第四节 案例解析:汶川地震时期的网络舆情引导	(193)
一、汶川地震时期的网络舆情特征与治理	(193)
二、汶川地震时期的网络舆情危机特征与治理	(195)
三、汶川地震时期网络舆情危机治理模式特征	(197)
四、汶川地震时期网络舆情危机治理模式的普适性	(199)
 第六章 组织凝聚能力	 (201)
第一节 把握组织凝聚能力的内涵	(202)
一、组织宗旨	(202)
二、组织伦理	(204)
三、组织结构	(207)
第二节 增强组织凝聚能力的意义	(210)
一、克服角色“缺位”,发挥网络党组织的组织引导作用	(210)
二、克服功能“缺位”,发挥网络党组织的组织吸纳作用	(215)
三、克服价值“缺位”,发挥网络党组织的组织同化作用	(219)
第三节 提升组织凝聚能力的途径	(223)
一、提升凝聚意识,使网络党组织成为党员管理的组织载体	(224)
二、确立服务意识,使网络党组织成为利益表达的畅通渠道	(227)
三、增强开放意识,使网络党组织成为社群合作的联系纽带	(232)
四、树立危机意识,使网络党组织成为舆情治理的主要力量	(236)

第四节 案例解析：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展“网络党”建设	(240)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0)

导 论

克服信息时代“本领恐慌”， 积极提升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信息时代所蕴含的巨大变革力量，有着冲决一切旧的工业时代印记的内在冲动，对活跃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特殊组织——政党，及其植根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讲话中指出，随着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博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这一现实问题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在探索加强与新群体、新组织的联系时，要着眼新的社会发展需求，培育新的社会治理能力。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体系中新的生长点，不仅成为党克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治理“本领恐慌”的需要，更成为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组成。

一、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现实挑战

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组织结构、工作习惯等多

种因素交互影响的具体体现,是党在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作风和情感的总和。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在中国社会形态(尤其是信息化技术引起的)发生深刻变迁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形式,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以实现党的纲领宗旨为目标指向,是由党的政治理念价值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政治理念价值虽然是政党社会治理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作为实现政治理念价值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受到社会变迁、技术变革、心理变化和价值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地调整适应。因此,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具有相对的动态性。可以说,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性,体现了政党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经验性的完整统一。信息时代的到来及其内在变革性,打破了建构于工业化时代基础之上的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稳定性,加剧了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动态调适程度,对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具体来说,这一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环境的挑战。信息时代的基石是信息化的社会环境。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对物质和精神的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的产物。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会产生和塑造不同的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信息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着不同的要求。

在工业化社会环境中,以集中化、权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自上而下的运行要求,是保证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组织范式,也是工业化社会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社会环境对政党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直接影响就集中体现为政党内部组织运行的集中性和外部社会联系的中心性两个鲜明特征。这种特征又是与工业时代以报纸、电台、电视等为代表的社会技术塑造的明确的社会结构的内在特性相适应。“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忽略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区别。地点决定了大多数的社会信息系统。一个给定的地点一场景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其他地点一场景相隔离。距离是封闭和隔离社会的手段。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需要花费时间。因为只能通过固定的门才能进入房间和建筑物,所以人们过去以一种可明确观察和可预测的方式被接纳或排除于某个场景。但是现在

电子媒介介入了原先由物质地点所确定的场景。”^① 无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都表现出了党内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党的领袖（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等）享有崇高的威望；都表现出了党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政治、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党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性、权威式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分不开的。“联共包揽一切，并声称它是人民的权威代言人。其政策不是通过在公共的政治场所进行辩论来检验，而是通过官员之间的私下讨论，以及在全体党员或更大范围内的阐述和解释。其合法性不是基于选举的成功而是基于革命原则和先例。”^② 然而，进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通讯技术革命的发明和广泛运用，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一个开放的社会日益形成。“由于代码的不同，电子媒介打破了印刷媒介所塑造出来的专门的、互不相同的信息系统，现在各不相同的人群共享着更多的信息。”^③ 其中，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促使适应于工业化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日益向多样化、去中心的离散形态发展。政党作为传统政治生态的主要政治力量，在社会结构分散化的趋势下，也愈来愈难以维系其政治“独角戏”，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权力和工作方式也被迫进行改革和转型。德国社民党在 2007 年公布的《汉堡纲领》就是对这一信息时代要求的主动适应。纲领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寻求组织对话的，我们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社会中心出发，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未来。还从未有一个德国政党的纲领是在如此广泛的民众参与中产生的。”^④

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既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普遍性，同时

①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9 页。

② [美] 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著，张定淮等译：《政治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页。

③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 页。

④ 张文红译：《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汉堡纲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 年第 4 期。

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从革命型政党转向执政党这一政党身份的深刻变化,以及党领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更是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具有了强烈而鲜明的中国特点,即集中性、封闭性与运动性。所谓集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垄断性;所谓封闭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内部运行的秘密性;所谓运动性,是指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外部动员的社会性。应该承认,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上述特征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核心和纽带,有效地保证了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稳定,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信息化社会迥异于工业化社会的内涵必然会对党的现有社会治理方式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即党如何改革、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方式,以主动适应已经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新环境?这是信息化社会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的第一个严峻挑战。

其次,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群体的挑战。信息时代的活动主体是信息化的人。从相当意义上讲,不同类型的人是由不同类型的信息场域塑造的。梅罗维茨认为:“群体身份是基于‘共享但特殊’的信息系统。不同社会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多,不同‘群体’的数量也就越多;不同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少,不同群体身份的数量也就越少。因此,由于电子媒介所引起的许多原来不同形式场景的融合,将对群体身份产生同化影响。”^①无论是作为群体的社会大众还是作为个体的人,这种同化影响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信息化的思维方式。所谓信息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认识问题时的非线性式、共域性、系统化的思维过程,表现出横向平面的思维偏好。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的开放与流通,对个体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往往受到更多外界相关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得益于更多外部信息的支撑,从而在认识上表现为多种而非单个的观念集合。与工业化社会线式的、二元化的思

^①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页。

维方式相比，信息化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外部相关性和观念动机的复杂性。由此，个人或大众的信息化思维方式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现实挑战。即，严格奉行自上而下的单一线性思维的各级党组织，究竟应该如何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充满了丰富可变思维的信息化大众？又应该如何规制党组织内部的关于及时性沟通时的话语授权，并以此来平衡上下级的组织关系？

二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信息化社会对大众或个体的另一影响就是信息化的行为方式。所谓信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和社会参与机会的日渐增多，大众或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抉择的行为。在传统的机械工业时代，由于劳动分工高度的集约化、组织化，大众个体依附于各种类型的组织体系之中，个体角色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一样，泯然于众而鲜有特性。这一组织特性是由工业时代的组织社会化的必然结果。米歇尔斯指出：“任何大规模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带来技能上的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结果，做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有技能，这一权力随之被从大众手中抽走而集中于领导者的手里。这样，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将自己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行动主体。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赋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组织使得政党或专业工会分化为少数领导者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领导者。”^① 这一组织发展和运行的结构要求，使得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没有相应的组织帮助，个体的力量往往是渺小的。与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反映就是大众个体政治理念尚未有脱离组织的冲动。但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促进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同时，渺小的个体力量通过发达的信息网络实现了瞬时联结，个体的力量通过网络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影响社会的能力得到不断加强。正如梅罗维茨所言：“当信息系统是孤立的时候，权威得到了加强；当信息系统融合后，权威就变弱

^① [德] 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了。……因此，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将社会中不同人的知识分开，该媒介就会支持越多的权威等级；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融合信息世界，媒介就会越鼓励平等的交往形式。”^① 在这一由于信息技术促成的深刻社会变动下，政党所提供的组织力量开始受到削弱，大众自身的政治选择需求得到大幅提升。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深刻变化对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带来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理性化、差异化与传统组织动员的情绪化、均质化之间的矛盾？作为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模式显示了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共济时艰之时的巨大威力和社会有效性。但是，应该指出一点的是，大规模群众动员的社会有效性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均质化、大众利益的一致性和社会环境的道德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不断深化的改革推动下，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既存的社会结构由于不断重组而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大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无法遮蔽个体利益的日益彰显、革命化的社会道德情境不断被经济利益的追逐而消解。当产生形成党的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痛苦的变革之时，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又岂能因循守旧、执著于昔日的荣光呢？

最后，党的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信息化社会技术的挑战。信息化社会技术是支撑和维系信息化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同的社会是由不同的社会技术维持运转的。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工业化社会是建立在以报纸、电台、电视等为主要代表的机械化社会技术之上的。机械化社会技术在信息传播上属于单向传输，即从一个中心信息源出发，向多个末端接收传递相关信息。这种信息单向传递方式，是与机械工业时代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相适应的。由此决定了工业化社会中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即政党可以通过对报纸、电台和电视等媒介信息载体的把持或共谋，扩大党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覆盖面。“印刷媒介的复杂、循序渐进的特征促进了广泛而相关的描述和分析的发展，但也会造成能接触某个信息系统的人和不能接触的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印刷代码的线性结构使得不同的专家采用不同的探究‘路线’。电视则打破了不同领域间的障碍，但是它更喜欢片断的信息，而不是长篇大论，有内在联系的讨

^①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论与分析。”^① 不过，机械化社会技术最大的缺点就是：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的接收者无法有效传递反馈信息，以便通过信息的交流沟通来提升信息的使用效能。因为“层级沟通机制可能在一定抽象意义上是‘理性’的，但根据人类沟通的理论，层级沟通不符合信息成功交换的基本规则”^②。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社会技术则在根本上克服了机械化社会技术的这一缺陷，使得信息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推进了信息网络社会的形成与确立，并日渐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与机械化大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网络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是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③。可以说，信息的自由流通构成了信息网络社会的核心要素，成为信息网络社会的根本基石，促进了信息网络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信息网络社会的这一发展趋势，对于现实的政党政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党与政治信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即政党从垄断政治信息开始被迫转向适应政治信息的分散流转。造成政党信息垄断权分离的原因很多，比如政治环境的日益透明、民主诉求的不断高涨、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等等。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由于政治信息的收集整理所需的成本投入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承担的能力，所以此类工作通常是依靠社会组织力量来完成的。政党作为社会组织力量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政治信息的加工整理一般是由政党来负责完成。可以说，“政党作为政治机构的确定性特征就在于，它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机制，是二者之间的联结纽带”^④。这种特殊的组织定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以及为此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但是随着电子通讯技

①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 页。

② [美] 多丽斯·A. 格拉伯等著，张熹珂译：《沟通的力量——公共组织信息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3 页。

③ [美] 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6 页。

④ 林勋健主编：《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术、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信息的流动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而且速度不断加快，从而大大降低了信息采集、编码、传递的成本，使得社会民众对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快捷方便，政党再也无法独享信息垄断所带来的政治权力。正如现实生活中网络反腐之所以会对制度性反腐造成有力冲击，其原因就在于：信息化社会技术与生俱来的共享性带来了公众对社会信息的共有性，并由此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参与能力和民主监督能力。因此，信息化社会技术带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挑战就是：当党和群众共处同一信息网络场域之时，党如何改善社会治理方式以实现为群众的有效引领呢？

二、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基本原则

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就当代中国国情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较长时段的过渡时期。在工业化社会正逐渐成熟确立，而信息化社会却已渐露峥嵘的时候，这一过渡时期必将是新旧并存、思想激荡、规范重组的复杂时期。党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将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反对与坚持、对立与融合的矛盾心态中完成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嬗变之路。“信息系统的融合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即刻的社会一体化或社会和谐。实际上，信息整合的最初结果是加剧社会的紧张。信息整合本身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物质的、社会的，以及法律上的分隔。原先被排除的人群不再接受‘他们的地方’的说辞；他们试图取得平等，而许多有特权的人群则试图维护旧的排除方式。因此，当电视完成了对美国家庭的‘入侵’后，种族之间的紧张感及其他形式的整合达到顶峰时，就不会那么令人吃惊了。”^①因此，必须着眼于信息化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开放灵活的原则。党的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开放灵活的原则，主要是由信息化社会的开放性决定的。社会结构的日益开放和公众参与能力的不断提升，要求党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等方面进一步增加公

^① [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

开透明的程度。

党的传统工作方式遵循的是组织保密原则。这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环境决定的。陈云指出：“大后方的党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之下，如果不秘密隐蔽的组织，就不能存在。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种秘密隐蔽的时间不是短促的，而是长期的。因为革命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胜利，所有在阶级敌人统治区域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是秘密的。”^①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惨痛教训就是：要加强组织工作的秘密纪律和组织形式的保密原则。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严格规定了秘密工作纪律，强调“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②。1928年5月18日，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要求“在秘密环境中务使党的组织适合于这一环境，使敌人不易破获党的机关与组织，或者破获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的部分”^③。对于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则要求因地制宜，保密第一。陈云指出：“今后党的组织形式，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敌一网打尽。因此，平行组织，个别联系，党员转移地址不转党的关系等等办法，各级党委都应采用。必须个别联系的党员，一律不编入支部。每个支部决不能超过三五人。支部和各级党委一般的不开会议，只作个别联系。对党员的教育，一般的知识依靠自修；自我检讨、纪律教育则由党内进行。”^④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逐步进行了公开建党的尝试。1948年5月3日，中共牡丹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公开建党，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使群众能够监督党，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强调“所谓公开，是组织公开，并不是把党内带秘密性的东西都公开了”^⑤。新中国成立后，中

①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6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④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

⑤ 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疆旭日——牡丹江市接管与社会改造》，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67—71页。